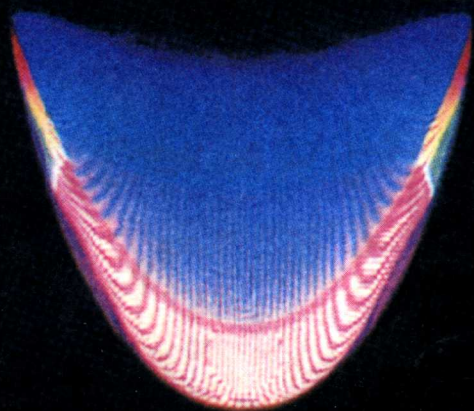




当代文艺思潮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语文教研室

.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当代文艺思潮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语文教研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京)新登字1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艺思潮研究/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语文
教研室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6

ISBN 7-5035-0769-1

I. 当…

II. 中…

III. 文艺思潮—中国—当代—研究

IV. I 206.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北京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80千字 印数: 1—2500册

定价: 4.80元

目 录

前 言	(1)
从“阶级的文学”到“人的文学”	
——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	谢武军(2)
从“外部规律”到“内部规律”	
——新时期文艺研究的新趋势	谢武军(22)
从“反映论”向“主体论”的倾斜	
——新时期文艺观念的论争	谢武军(39)
现代主义与新时期文学	张筱强(60)
关于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陈宇飞(79)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崛起	李慧英(100)
“纪实文学热”透视	李慧英(121)
通俗文学在大陆的复兴与发展	刘 忱(139)
“文化反思”背景下的“寻根文学”	刘 忱(153)
文化市场与文化法规	魏天祥(168)
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发展	魏天祥(186)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现状与趋势	蔡晓云(204)

前 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文艺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理论现象和创作现象，形成了与前三十年迥然不同的文艺倾向和潮流，呈现出繁荣与混乱共生、生机与危机同在的状况。对这些现象和状况进行梳理和反思，从理论上给予总结和评价，以利于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文艺理论界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编辑本书的目的，正是试图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思潮进行概括和评论，对若干重大文艺现象进行研究和探讨。书中的十二篇论稿，反映了近年来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部分课题曾在不同班次讲授过，此次公开出版，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教学的急需，另一方面也可作为一家之言，参与社会的争鸣与探讨，为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在编辑过程中，教研室只提出客观反映事实，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评价的基本要求。至于每篇文章怎样写，作者有充分的自由。由于理论水平和阅读范围的局限，我们的概括未必恰当，我们的分析未必准确，更说不上深刻，也可能还有一些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希望得到学员和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正。

本书由谢武军统稿，统稿的原则是只做必要的文字上、技术上的加工，观点上的问题与作者商榷，由作者斟酌定夺。

编 者

一九九三年一月

从“阶级的文学”到“人的文学”

——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

谢 武 军

文艺思潮的嬗递是西方近代以来文艺发展的主要形式，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到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都是既有其鲜明的理论形态，又有其雄厚的创作实绩。一大批作家在统一的创作纲领、原则之下联合起来，按照这样的纲领、原则进行创作，并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的作品。从总结西方这一文艺现象入手，一些文艺理论家认为，创作形态和理论形态的统一是判断是否形成某种文艺思潮的重要标准，只有新的理论主张而无创作实践做后盾，或只有新的创作实验而未形成明确的共同的创作原则，都不能称之为文艺思潮。用这样的标准来分析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流变，很难把它框范进某种文学上的主义，但却可以用一个现成的哲学、伦理学术语来概括，那就是人道主义。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倾向，确实具有思潮的性质，因为在新时期十年中，不仅有若干次文艺论争为它在理论上进行鼓吹，而且产生了一批相当有代表性的作品。从1979年春天讨论“文艺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开始，到1989年讨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为止，文艺界所集中关注的是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政治功能问题。人们从文艺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问题，向几十年来左右文坛的阶级斗争学说挑战，出现了明显的以人道主义代替阶级斗争学说，以“人性论”代替“阶级论”，把“阶级的文学”变为“人的文学”的倾向，在中国文坛形成一股强

大的人道主义潮流。

(一)

对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家，并没有明确的理论认识。因为，对阶级斗争规律的发现和认识，按马克思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功劳。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文学，虽然也有许多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统治者残酷腐朽的作品，但并没有将其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五四”前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旧文学是与封建贵族阶级相联系的，他们力主发展与平民相联系的新文学。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造”、“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思想促使新文学家将农民、其它劳动者和新型知识分子作为自己描写的对象，并且用白话文（复古派文人林纾讥之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取代文言文，使文学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近了一大步。外国文学、尤其是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介绍也给中国作家以启示，使他们从中看到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挣扎”，明白了“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沈泽民、蒋光慈等人写了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提倡为工农大众的“革命文学”。“五卅”前后，进步文艺界迅速站到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边，为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摇旗呐喊。当时国内两大主要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虽然在创作方法上各有主张，但在政治立场上却基本一致，都主张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当时流行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布尔乔亚文学”等术语，清楚地标明了文学的阶级属性。在1928和1930年间关于无产阶级文学、唯物史观和“文学的阶级性”的论争中，革命文艺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批判了超阶级的文学观和“第三种人”的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文学观。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联”、抗战期间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到1949年7月几乎所有知名作家、艺术家汇聚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国进步文艺界实际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发挥了革命的一个方面军的作用。也就是说，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文艺就与中国的政治，与复杂残酷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相连。文艺是有阶级性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等观念几乎成为文艺工作者的共识。毛泽东的“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等论述，无论文化人或非文化人都深信不疑。

我们一点也不否认这些观念和认识的真理性和真理性，更不否认它在革命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但是，任何真理如果把它推到极端都可能变成谬误。从阶级斗争学说派生出来的文艺观也是如此。当新中国成立后，当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本来准备适应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组织伟大的历史转折，从“破坏一个旧世界”转向“建设一个新世界”，然而却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并没有从观念和实践两方面去组织这种转折，反而把一切工作都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文艺上，受“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文艺从属于政治”等观念的支配，舆论界往往上纲上线，人为地赋予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的争论以浓重的阶级斗争色彩。文艺上的学术争鸣往往变成政治斗争，并被曲解夸大成为不同阶级之间的较量。在文艺界所进行的一系列批判和斗争，往往成为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先声。直到发生以所谓“文学批评”开头，以毁灭文化告终的“文化大革命”，广大

文艺工作者与全国人民一道蒙受了深重的劫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废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使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中，从阶级斗争学说派生出来的文艺观也首当其冲地遭到人们不同程度的否定与抛弃。这既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改变、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文艺界所引起的必然反响，也是人们对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逆反心理的表现。

(二)

这股把文学从“阶级的文学”变为“人的文学”的潮流，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五次大的论争：

第一，关于文艺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讨论。1979年4月，《上海文学》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此文从四个方面说明自己的观点：①“工具说”不科学。“工具说”并不能概括文艺的本质属性，因为文艺在阶级社会以前就已经存在，在阶级社会消灭后仍将继续存在。即使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阶级斗争也并不能囊括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是某部份文艺作品的某一种功能，而不是整个人类史上文艺作品的全部职能。②“工具说”并没有准确反映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政治的概念比阶级斗争的概念更为宽泛。对文艺说来，它的政治功能虽然是重要的然而并不是唯一的，文艺是真善美的统一，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并不是单纯的政治传声筒。③“工具说”忽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是造成文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四人帮”鼓吹的“三突出”、“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等等都是以“工具说”为理论基础的。④“工具说”并未准确反映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把文艺与阶级的欲望和意志的关系作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来考察，抹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是唯意志论对文艺的糟蹋。此文一出，

许多文章起而响应或与之辩论，形成了一场持续八个多月的大讨论。响应者从各个方面证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定义是不科学的，不准确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艺上的体现，其社会效果也是不好的。也有一些文章继续肯定“工具说”，认为它概括了文艺的本质属性，是科学的口号。讨论的结果，“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不再时髦，而高尔基的名言“文学是人学”却成为文坛上一个响亮的口号。

第二，关于文艺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讨论。1978年底1979年初，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他的《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西方美学史·序论》等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文艺是意识形态，不属于上层建筑。他认为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之间是平行的关系，二者都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且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三者都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朱先生提出了五点理由：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平行的，只有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机构。”②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就如同把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等同起来一样错误，上层建筑是客观存在，意识形态是“精神生活”，只是社会存在的运动和变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③意识形态有自己的历史持续性和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过去历史留传下来的“思想材料”，要对下一阶段的意识形态发生作用和影响，构成历史文化批判继承的前提。④上层建筑比意识形态离经济基础更近，对基础所起的反作用也更直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列宁），意识形态则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法律”和“法律观点”、“政治”和“政治观点”总是并提而截然分开的。⑤确认上层建筑包括政权、政权机构和意识形态两项，在二者之间

划等号是以偏概全，过分抬高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抹煞了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的巨大作用，是唯心主义的。大多数争鸣文章都不同意朱先生的“文艺非上层建筑说”，指出文艺作为意识形态之一也包括在上层建筑之内，也要受上层建筑一般规律的制约，但不能在文艺和政治之间划等号，文艺有其特殊性，甚至包含某些非上层建筑因素。后来朱先生声明，他并不怀疑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可能是写文章没有写清楚。^①其实，朱先生写文章的目的是想说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和上层建筑是等同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政权机构等等，说文艺属于上层建筑就等于说文艺属于政治。他想强调的是文艺与经济基础的联系，这一点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所宣传的只是“文艺从属于政治”，似乎文艺与经济基础无关。朱先生强调文艺等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让我们回到唯物主义。但是如果否认政权、政权机构等作为社会存在，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也要对文艺发生影响，那就成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了。

第三，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等观点的讨论。实际上，前两个问题也属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因此这场讨论应该说从1979年初即已开始。但是，前两个问题的讨论在政治上远不如这场讨论敏感，因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几乎都可以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找到出处，对这两个口号的讨论，实际上已直接引入对毛泽东的某些文艺观的讨论。这场讨论主要文章约四百多篇。1979年9月以前，大部分文章讨论的是文艺如何从为阶级斗争服务转向为“四化”建设服务，因为“四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仍然未离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路。9月以后，出现一批文章对这两个提法本身提出质疑，把讨论深入了一步。比如周介人《不要笼统提

① 《马列文论研究》第一卷第263页。

“文艺是政治的反映”》(《文汇报》1979年9月6日)、毛星《文艺与政治》(《新港》1979年10月12日)、常荣根《“从属论”应当破除》(《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白桦《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文汇报增刊》1980年第1期)、王若望《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敏泽《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王之兰《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政治也要为文艺服务》(《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华昆仑《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工人创作》1980年第2期)、王春元《“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个错误的口号》(《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寒溪《文艺为政治服务弊多利少》(《鸭绿江》1980年第8期)、周扬《关于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人民日报》1981年3月25日)等。单从文章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观点的纷纭。讨论中,对“从属说”、“服务说”大致有四种态度:①根本否定,认为“从属”、“服务”的提法,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某种积极作用,但它从来就是“片面”和“不科学”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成为文艺发展的“绊脚石”,必须“彻底抛弃”。文艺与政治只能是互相影响的关系。②全盘肯定,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体现着一定文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必须坚持,不能动摇。③一半否定,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是错误的,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正确的,后者并不是由“从属”决定的,它是阶级社会中的客观事实。文艺上的种种弊端都来自“从属论”,必须破除“从属论”,坚持“服务论”。④过时论,“从属”、“服务”的提法在解放前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候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经济体系,主要任务是搞政治斗争,而当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之后,再提为政治服务就错误了。尽管有四种不同的态度,而在讨论中大多数论者是持“过时论”和“否定论”的,他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其弊端,指出其危害,为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否定“从属说”、“服务说”的文章都申明

反对两个提法并不等于鼓励文艺“脱离政治”、文艺应自觉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适应“四化”的需要。

这三场大讨论直接发源于对“四人帮”阴谋文艺的批判，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作为对文艺界这几次大讨论的反应和总结，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在1979年10月31日开幕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首先公开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①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②1980年2月，当时文艺界的负责人周扬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阔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我们提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吗？”^③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公开宣布了文艺工作总口号的改变。从此，新的“二为”方针成为党和大多数文艺界人士所一致肯定的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方针。从阶级斗争学说派生出来的关于文艺的若干提法寿终正寝。不过，从此后，全党全民在论争中统一认识的时代

①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87—188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0页。

③ 见《中国文学年鉴》1981年第224、226页。

似乎也结束了。

(三)

第四场讨论是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它是人道主义思潮的集中表现。这场讨论从1979年开始，1984年前为第一阶段，1986年后为第二阶段。从理论权威到莘莘学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报刊都卷入其中，波及面之大，影响之广是其它学术论争不可比拟的。这场讨论肇始于文艺界，以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王磊《人性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为发端。他们虽然从文艺创作和美学研究的角度提出问题，但却涉及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哲学评价。于是围绕什么是人性，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什么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是否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等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哲学大讨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各执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比如，关于人性的定义即有十来种之多，如人性即人的社会性，人性就是人类自然本性，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性即人对自由的追求，人性即人的由社会关系决定的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产生的社会需要等等。对人性与阶级性、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也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在人性与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中，阶级性占主导地位，人性受阶级性制约。因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制约社会关系中其它部分的核心部分，不可能有任何一种超脱这种制约的社会关系。所以，作为受一定社会关系所决定和制约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不可能不为阶级性所制约，不可能有超脱阶级性的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性不等于阶级性，阶级性是人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短暂的特殊表现。一方面阶级性是特定条件下的具体人性，它是相对

的；另一方面阶级性作为人性的异化物，它又是根本上排斥人性，践踏人性的，所以阶级性就是非人性。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性的内容并不全部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人的社会性的决定方面，但人的社会性比阶级性的范围要宽广得多，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精神关系、家庭关系等等。

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道主义是否有广义狭义之分，二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对人道主义历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人道主义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广义的人道主义就是泛指一般主张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人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等的思想和观点。广义人道主义的存在是由整个阶级社会中异化压抑人类自主和自由的本性这一事实存在的广泛性决定的。它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始终，是世代相继的一种进步社会思潮，是流贯整个阶级社会始终的漫漫长河，是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共同创造，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否认人道主义思潮的广义性，是违背人类思想史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广义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有特定的历史含义和明显的阶级属性，不能把一切关于人的思想，把某些貌似相同的思想、观点都放到人道主义的范畴中去。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道这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关系形成之后才产生的。如果认为有广义人道主义存在，实际上就是承认人道主义具有超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全人类性和永恒性。

对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但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在某种条件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人道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可以经过限制或改造而被包括在共产主义理论之中。但

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同的。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未能跳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框框。有的论者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了传统的人道主义的积极内容，但人道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核心。另外一种意见则与上述见解针锋相对，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两种有原则区别、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不包含人道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消融于人道主义之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二者在出发点和理论核心、基本原则、阶级基础、变革社会的手段等方面都是不相同的。

在是否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异化”问题上，观点也截然相反。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异化，而且表现在各个方面：现代迷信即思想上的异化；公仆变成老爷即政治上的异化；不尊重经济规律，不讲生产目的性，片面发展重工业、环境污染即经济上的异化；“造神文艺”、“阴谋文艺”而不是为人民的文艺即文艺上的异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就包含着克服异化的内容。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既不符合马克思所使用过的异化概念的内涵，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如果用异化来解释现存的一些现象，就会使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怀疑，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是怀疑、否定社会主义这股思潮的哲学表现和理论概括。

国内众多知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美学家的投入，给这场讨论渲染上一层浓重的思辨色彩，标志着对狭隘阶级论和教条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批判从现实政治层面上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尽管在讨论中人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都承认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提出有它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必然性。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十年动乱，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人性泯灭、兽性泛滥，是促使人们转向

人性论、人道主义的主要原因。

1983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批评说：“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现在有些同志……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①随后，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对“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非人——人”的历史公式、社会主义社会异化论、抽象地宣传“人的价值”“人是目的”等进行批评。区别了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以及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宣传和实行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胡文指出，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在于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

1986年，这场讨论在一度中断后又继续进行。虽然规模和声势远不如1984年以前，但理论主张上的距离却拉得更远。一些同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27—29页。